

後記 農業社會主義批判^①

王小強

什麼是農業社會主義？新華社1948年〈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一文指出：

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是抱有這一類思想的。¹

俄國的民粹派，被列寧稱作「舊時農民社會主義」、「小市民社會主義」、「農奴社會主義」和「反動的社會主義」。²民粹派被資本主義在農村造成的兩極分化嚇昏了頭腦。他們從抽象的道德觀念出發，否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意義，把落後的小生產理想化，把原始的農村公社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油彩，「同情那種把半農奴半自由勞動的舊時美好制度（這種制度具有各種各樣的剝削和壓迫的慘狀而不給人以任何出路）永恆化的措施」，³「寧肯讓農民繼續停留在自己陳舊的家長制的生活方式中，而不要在農村中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⁴所以，列寧認為：「這種理論從出現之日起，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理論。」⁵「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無條件是反動的」。⁶

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與俄國民粹派的理論，本質上同屬小生產者反動的空想，但表現形式卻有明顯的不同。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一不同於西方封建社會莊園經濟的顯著特徵，往往

產生大規模的週期性土地危機，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的現象。在頻繁激烈的土地兼併中，中國農村的小生產者不斷破產，經常處於「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境遇，淪為比西方農奴更為悲慘的「無產者」，從而使他們早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前，就對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深惡痛絕，迸發出平均分配財富的強烈空想。另外，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理論上並沒有形成什麼完整的體系，可是在實踐上，卻遠遠超過俄國民粹派和西方任何空想社會主義者。一般說來，祇要能夠存活，農民是不會要求平分財產的，祇有在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裡，平均主義思想才有如決堤之水，汪洋恣肆。所以，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主要的不是靠知識分子著書立說逐漸完善，而是與中國歷史上規模極大的農民起義緊密聯繫在一起，在實際行動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早在西元二世紀東漢末年，張魯政權就以五鬥米道的宗教關係，結成原始公社式的組織，並從事「義米」、「義肉」、「義舍」等公共事業。唐末的王仙芝，揭竿而起時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北宋的王小波大聲疾呼：「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南宋的鍾相、楊么起義，打出「等貴賤、均貧富」的旗號。明末的李自成，用「均田免糧」為號召。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平均主義與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觀相結合，更將農業社會主義具體化，並在權力所及的範圍內大規模地付諸了實踐。

1853年，太平天國頒佈著名的《天朝田畝制度》，詳盡地描繪出農業社會主義的模式。這個文件根據「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的公有原則，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的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同時，根據同一原則，《天朝田畝制度》要求人民25家為一「兩」，組成生產、分配、軍事、宗教、政治、教育等幾合一的農村公社。在這種公社中，生產資料和剩餘產品一律歸公。「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芋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

^① 本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作組編《未定稿》第49期，1979年12月15日。

亦然。」群眾生活則靠「聖庫」平均供給來保證。太平天國的人們以為，一切都軍事化、集體化、規格化，人人都過「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就能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⁷的平均主義烏托邦。

太平軍長期處在戎馬倥傯之間，沒有一個安定的局面，無法將這些理想實現，祇好「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⁸可是在太平軍內部，則一直實行軍事供給制。建都南京，取得行政權力之後，太平軍就開始按照小農的理想改造世界，樹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業社會主義理想國的樣板。其大致改革如下：

一、取消私有制，實行「共產」生活。太平軍軍律規定：不得私蓄財產，「凡私藏金銀剃刀即是變妖，定斬不留。」⁹佔領南京後，太平軍馬上沒收人民的財產，除個人隨身攜帶的少數生活必需品（如衣褲被褥等）外，一切商店貨物、民間糧食、房屋田產、金銀珠寶統統繳公。所有軍民的生活由各地「照舊交糧納稅」為物質保證，實行平均主義的軍事供給制，吃飯不要錢。

二、取消商品生產。錢、財、糧、物一律歸公之後，全體市民按軍事編制編入各種行業的組織中，行動軍事化。手工業者則編入「國營」手工業作坊——「諸匠營」和「百工衙」，從事有組織的集體生產。

三、禁止集市貿易。財產公有，生活供給，當然無需貿易互通有無了。太平軍曾出告示說：「天下農民米谷，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¹⁰在一切貨物、店鋪歸公之後，即使「鋪店照常買賣，但本利皆歸天王，不許百姓使用」。¹¹

四、取消家庭，生活集體化。財產公有，生活供給，教育由「天國」負責，家庭「三要素」（生產單位、消費單位、教育單位）隨之消亡。太平軍嚴禁姦淫，明令諸王得娶妻納妾，他人卻一概不准與異性接觸，雖夫妻、母子不得聚首。太平軍攻克南京後，即將百姓從家中逐出，分為男女別館居住，「男有入女館者，無問軍民殺無

赦。」¹²「雖夫妻同宿，也視同犯奸，治以極刑。」¹³

五、文化「革命」。太平天國對儒、釋、道三教徹底查禁，同時將「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¹⁴「凡一切妖書如有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¹⁵後來，太平天國又規定了「旨准頒行」制度，一切出版物須「呈獻我主萬歲萬歲萬萬歲旨准頒行，但世間有書不奏旨、不蓋璽而傳誦者，定然問罪也。」¹⁶再後，又成立了「刪書衙」，專事刪書工作。所有書籍須經此機構將其中「鬼話、怪話、妖話、邪話」一概刪剝淨盡，才能誦讀。同時，太平天國在生活方面，除了厲禁鴉片、賭博、娼妓、遊惰、纏足等陋習外，飲酒、吸煙、長指甲、剪髮剃胡刮面，「養鳥鬥蟀打鶴賽勝，戒箍手鐲金玉粉飾之類，」「演戲鬥劇」¹⁷等諸端都在該禁之列。抽煙喝酒、編歌作詩、剪髮剃胡刮面等，都是死罪。「如有聚人演戲者全行斬首。」¹⁸這樣一來，庶民百姓耳聞自睹的都是大一統的「革命」天條，不受異端邪說的蠱惑，固然思想純淨，精誠篤實。然而人們正常的文化娛樂生活，除了吟誦幾本刪削剪裁的圖書，看看天王、東王遊龍戲鳳的儀仗，其餘也一概全無了。

太平天國運動是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一次偉大嘗試。太平軍本要建立「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¹⁹的人間「天國」，推行的結果，卻如《楊秀清誥諭天京人民》中所承認：「在爾民人以為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產為之一空，妻孥忽然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²⁰可見這許多極端措施已使人民極為反感。不容否認，軍事供給制在戰爭環境中能夠團結官兵，是十分必要的。這些改革，主觀上也確實反映了勞動人民要求消滅剝削制度的善良願望。可是將這些「不僅是超出現在，甚至是超出未來」²¹的荒謬空想作為改造世界的措施付諸實踐，失敗是在所難免的。廢除商業的政策祇在市內執行了一段時間；取消家庭生活的制度兩年後不得不廢止；各種匠營、館集中的人大批逃亡；「吃大鍋飯」由於接濟不上，最後祇能喝粥；領導幹部貪污受賄、發財致富早就使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名存實

亡。這裡，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恰恰就在這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改革實行並逐一破產的同時，太平天國兩次頒佈《太平禮制》，按照徹底的封建綱常倫理，建立起一整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等級制度，其森嚴完備的程度，與舊的封建制度毫無二致。最後，洪秀全的「天國」化為泡影，他自己卻大興土木，廣置妃嬪，深居簡出，出警入蹕，成了名符其實的人間皇帝。

二

太平天國運動近百年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工農政權，創造了勞動人民徹底解放的先決條件。可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脫胎出來的新中國，如何迅速洗滌乾淨身上的封建污漬，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的確是一個前人不曾遇到的新問題。本來，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結果。我們要在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落後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肯定有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需要探討和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民人數佔人口80%以上的中國，我們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小生產者構成的。舊中國，極為有限的近代工業僅分佈在少數交通樞紐和沿海城市，內地廣大農村的經濟生活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革命的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但是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過程中，本來就為數寥寥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並沒有直接參加武裝鬥爭，革命首先和主要依靠的力量，是那些遠離城市、遠離現代文明的內地和邊區農民。²² 這些農民，一方面受野蠻的封建壓迫最深重，因而富於反抗精神；一方面又很少接受現代文明的陶冶，他們的政治覺悟深受其小生產者經濟地位的局限。他們習慣地憧憬著男耕女織的田園詩生活，幻想著人人平等、處處平均的分配方案。在我們革命隊伍中，一個時期內把「共產」當作動詞，誤認為革命就是「共」地主老財之產的人，是很多的。他們對革命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農業社會主義階段，以為奪取

政權，就是為了實現太平天國所未竟的事業。

民主革命中，我們黨為了堅持無產階級的政治方向，曾經對平均主義作過鬥爭，但矛盾並不十分尖銳。因為在農民幾乎無產可「共」的條件下，把「共產主義」作為生產高度社會化帶來管理社會化的科學概念去理解，還是作為平分地主財產的行為去描述，對於完成民主革命平分土地的主要任務，客觀上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對地主的土地、牲畜、農具和其他財物的再分配，就是對當時封建統治的一種直接否定。它能夠吸引廣大饑寒交迫的農民投身革命，並直接促進小農經濟的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從發展現代大生產的角度出發，為了在產品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各取所需，消滅三大差別，實現真正的平等，而要打碎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農業社會主義則從恢復自然經濟的角度出發，為了在普遍貧困的基礎上，維持自給自足的小生產，而要改造貧富過分懸殊的社會。兩種思想代表了兩個階級不同的世界觀，本質上屬於前進和倒退兩個截然對立的範疇，但是，作為同是被壓迫階級的理想，在否定封建大土地所有制這一點上，它們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歷史的辯證的統一。

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歷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工農聯盟仍然是革命勝利的保證，但是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臨時的「統一戰線」，卻已隨著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被消滅，而喪失了思想聯繫的紐帶。隨著革命進程的發展，農業社會主義將喪失它在民主革命時期有限的積極作用，淪為反動、倒退的思想。無產階級以發展現代大生產為實質內容的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民以維護原始小生產為實質內容的農業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勢必會日益尖銳起來。這就使我們這場以農民為主力軍的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在防止舊制度復辟的同時，更直接地面臨一個是按無產階級科學社會主義的面貌、還是按農民小生產者農業社會主義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問題。

發人深省的是，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農業社會主義，在中國有

著極為廣泛和長久的影響。它不僅祇是農民階級的空想，作為歷史上許多政治改革家的口號，它幾乎成了我們的「國粹」。早在兩千年前，孔夫子就從徹底的唯心史觀出發，鮮明地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²³的平均主義思想，描繪了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兩千年來，許多知識分子和地主階級政治家，大都重復了這一理想。到了近代中國，一般致力於社會改革的志士仁人、甚至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仍然脫不出這種理想的窠臼。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倡共產主義之新，往往成了復平均主義之古；社會主義明明是歐洲最新的思想，可是卻成了中國最古老的傳統的混合物。譬如：「行共產之說」、「倡共產之法」的康有為，頗受西方思想影響，卻據公羊三世說，提出「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認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家是「太平世最妨礙之物也。」「然欲致其道，舍去家無由。」他連篇累牘地提出「公農」、「公工」、「公商」，消除家庭和私有財產，其宗旨，還是孔子的「蓋均無貧」。²⁴章炳麟則荒謬地以為：古代「中國一切典章制度，總是近於社會主義，就是極不好的事，也還近於社會主義。」「不說三代井田，便從魏、晉至唐，都是行這均田制度」「均田一事，合於社會主義。」道理是「貧富不甚懸絕，地方政治容易施行。」²⁵就連最激烈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也認為：「民生主義，即貧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壓制貧者是也。但民生主義在前數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為何？即洪秀全是。」²⁶他反復指出：「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祇是共產，什麼事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要什麼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²⁷

這些社會活動家代表著不同階級的利益，反映了不同階級的要求，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小農平均主義理想的薰染。究其原因，他們活動的舞臺背景，都是廣泛存在的小生產；他們從事政治

改革的社會群眾基礎，都是廣泛存在的小生產者。在自然經濟的基礎上，他們的經濟改革不能不體現出這種生產方式的需要；在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中，他們的政治革命，不可能不反映出農民的要求。應當引起我們深思的是：與農民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剝削階級的政治理想，尚且不期然而然地反映了農民平均主義的要求，那麼，缺乏文化教養，又剛剛從農民中脫胎出來不久，並且在革命中以農民為依靠、為主力軍的中國無產階級，能不能把自己消滅剝削制度的理想與農民的平均主義區別開來，能不能克服被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刺激得更加強烈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使新中國走上一條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農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就是當我們在理論上開始研究、解決大量書本裡沒有的重大問題時，歷史為我們提出的批判農業社會主義的任務。在農民人口最多的國家中，我們去完成這個任務是極為艱難的。農業社會主義決非虛無飄渺的海市蜃樓，它始終建立在堅實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它不是一般的塵飯塗羹，它可以轉化成一股維護小生產的政治力量。所以，批判農業社會主義，不僅是一次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甚至意味著一場長期的政治鬥爭。列寧在總結社會主義理論鬥爭時指出：「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基礎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這個完全的統治，並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的，而祇是在同一切落後的學說如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作了長期鬥爭以後，才鞏固起來的。」²⁸遺憾的是，當時我們並沒有這樣清楚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1948年，毛澤東同志針對絕對平分土地的要求嚴肅指出：「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²⁹解放初，在黨的領導下，我們曾一度開展了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可惜，這個運動並沒有能真正深入下去。

三

土地改革以後，由於小私有制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在分得了土

地的農民中間，重新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苗頭。為了防止和改變自己破產的命運，一些貧苦農民自發地組辦了互助組、初級合作社。爾後，在黨的支持和領導下，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展起來。這條組織起來的道路，毫無疑問是正確的。為人民謀利益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決不能眼看著一部分農民重新陷入貧窮而袖手旁觀，我們有責任領導農民、幫助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所以，必須肯定合作化運動的方向和進步意義。

但是，對於合作社的性質，理論上還需要深入細緻的研究。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是現代化大生產與社會化管理的有機統一，僅就生產資料佔有的法權形式，並不能說明生產方式的社會性質。例如俄國、印度及我國廣泛存在過的農村公社，還有太平天國所嚮往的25家一「兩」的公有制經濟，顯然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

恩格斯在闡述共產主義原理時指出：「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制關係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同舊的所有制關係不再相適應的新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³⁰可是我國的合作化運動卻不是新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解放以後，我國工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原來祇佔國民經濟10%左右的近代工業，獲得成倍的增長。但是，生產力短短幾年的發展，並沒能根本改變社會經濟的基本結構和經濟生活的實質內容。在三大改造之前，我們仍然是一個前資本主義經濟佔主要地位的貧窮國家。1954年是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前一年，從糧食產量上看，根據《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一書的數字計算，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糧食約500斤左右，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約生產1600斤。^②而在兩千年前的漢代，我國平均每人佔有糧食就已達640斤左右，每個農業勞動力就能生產約2000斤糧食。³¹列寧說：「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³²可是我國1955年，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祇佔33.6%，而且50%是以農產品為主要原料的加工工業，機器

製造業祇佔整個工業的5.7%，³³能夠改造農業的主要機器（拖拉機）製造工業還沒有誕生。從農業生產力來看，合作化以前，我國貧農平均每戶祇有11畝七分耕地，二分之一頭牲畜，三分之一張犁，17分之一部水車；³⁴中農平均每戶祇有19畝耕地，不到一頭牲畜，三分之二張犁，13%部水車；³⁵就是所謂富農，也祇是平均每戶34畝六分耕地，兩頭牲畜，一張犁，三分之一部水車，剛能維持小農經濟罷了。貧農和中農佔全部農戶的91.2%。³⁶由此可以斷言：一些貧苦農民辦起合作社，不是由於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是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到連小私有制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都維持不住的程度，由於91.2%的農戶連一張犁、一頭牲畜這樣原始的生產工具都不具備的緣故。王國藩三條驢腿的農業社也能增產的事實，說明了在自願和自由結合基礎上組織簡單協作的必要性。但是面對這種因為極端貧困而組織的集體經濟，我們在認識上，如何求得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力發展決定生產關係變革的基本原理與實際的統一？如何求得由《資本論》奠定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的確是一個理論上很有意義、很有探討餘地的問題。

② 見國家統計局編：《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統計出版社1958年。

1956年糧食總產為3650235萬斤，為1955年的104.4%；1955年又為1954年的109%（見該書第154頁）；故1954年糧食總產應為：

$3650235 \text{萬斤} \div 1.044 \div 1.09 = 3207700.5 \text{萬斤}$ 。

1954年全國人口（不包括臺灣、華僑及國外留學生）602百萬人（見該書第2頁），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糧食應為：

$3207700.5 \text{萬斤} \div 602 \text{百萬人} = 533 \text{斤/人}$ 。

1954年全國鄉村人口520百萬人（見該書第2頁），按現在八億農村人口三億農業勞動力計算，1954年平均每個勞動者生產糧食應為：

$3207700.5 \text{萬斤} \div (520 \text{百萬人} \times 3/8) = 1645 \text{斤/人}$ 。

把這些不是因為生產發展而是因為貧困產生的帶有很大插俱、夥種性質的低級合作組織，過渡到以大機器工業為基礎的真正社會主義大農業的集體經濟，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既然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日積月累、循序漸進的過程，那麼這個過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列寧曾經指出：「從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這樣的過渡必然是非常長久的。採用急躁輕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祇會阻滯這種過渡，給這種過渡造成困難。祇有採取各種使農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農業技術的辦法來幫助農民，才能促進這種過渡。」³⁷ 1953年，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經濟落後的現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鄭重指出：「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³⁸ 然而，我們以後的實踐卻快得出奇。1953年，全國入社農戶佔農戶總數的0.2%。1954年年底10.9%。1955年下半年，確切地說是後兩、三個月，合作化的發展則來了一個「閃電式」的飛躍。1955年參加秋收分配的合作社的農戶佔農戶總數的14.2%，到了1956年1月底，就達到80.3%！與此同時，高級社也獲得了日新月異的發展。1955年年底參加高級社的農戶才達到4%，到1956年1月底，僅一個多月時間，就一躍為30.7%，6月底達63.2%，12月底就到了87.8%。不少互助組和個體戶，未經初級社，就「一步登天」，帶進了高級社。從1955年下半年農村社會主義運動高潮開始至1956年12月，入社農戶的比重由14.2%突飛猛進到96.3%，³⁹ 原來計劃「10~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完成的艱巨任務之一，祇用了不到一年半時間，就輕而易舉地完成了。

人們以為，合作化運動這樣迅猛的發展，是廣大農民蘊藏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迸發出來的結果。這種看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馬克思主義常識告訴我們，農民不是新生產方式的代表，不

是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創造者。作為封建生產方式的消極代表，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決定了農民祇能天然地具有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無產階級如果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灌輸，尚且不能成為自覺的階級，更何況農民。列寧曾反復強調指出：「祇有無產階級具有社會主義本性。」⁴⁰ 「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如果把農民當作社會主義者來制定我們的社會主義計劃，那就是把這種計劃建立在沙子上，不瞭解我們的任務」。⁴¹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運動，」⁴² 「把農民當作革命運動的體現者是荒謬的；黨如果認為自己運動的革命性取決於農民的革命情緒，那是愚蠢的。」⁴³ 可見，把合作化運動不正常的發展，歸咎於農民，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農民信任我們黨，有聽從號召和命令的積極性。但是廣大農民有沒有不是由於生產的發展、而是由於政治覺悟的提高，就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自願將一些低級互助組織一下子變成全國範圍的合作化運動的積極性？這就很值得懷疑。風馳電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之所以脫離了黨的總路線，犯了「左」傾的錯誤，與其說是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迸發出來的結果，倒不如說是一些農民出身或受農民意識影響嚴重的幹部蘊藏的農業社會主義積極性迸發出來、強迫命令農民群眾的結果。在農業社會主義那裡，生產力發展不發展，窮不窮，都無所謂。祇要財富平均，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範圍越大，財富當然也就越平均，因而也就越是社會主義。實踐證明一位領導同志1953年的一次批評是正確的：脫離了生產力的發展，用「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的方法，「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⁴⁴

1911年，孫中山曾認為：「考諸歷史，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同居，又共產主義之嚆矢。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宜其進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勢也。」⁴⁵ 誰曾想，他這番糊塗的論述，竟成了我們的讖語。47年之後，當我們一些同志「久蘊蓄社會主義精神」以「一

日千里之勢」迸發出來時，嘴矢之鏃變成「衛星」、「火箭」，濫觴之源匯成洪水滔天！

1958年，在「祇怕想不到，不怕作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類反科學的豪言壯語中，祇用了九個月時間，我們就「新建750萬個工業單位，產糧七千億斤，產棉七千萬擔。」⁴⁶ 河南省「商城縣超英人民公社，十天之中就能辦起鋼鐵、機械、化肥、水泥等4500多個工廠」！⁴⁷ 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衛星」：「一畝山藥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20萬斤」！⁴⁸ 在那「一天等於20年」的年月裡，就連《人民日報》的編者也無限感慨地說：「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真像神話時代。」⁴⁹

生產力發展的神話，當然帶來生產關係飛躍的神話。順便指出：這些神話都是由包括「辯論」、圍攻、批鬥、甚至打人在內的「命令風」實現的。1958年，全國農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新高潮，很多地區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大泛濫，鋪天蓋地地刮起一場「共產風」，大規模地「共」各種產。

人民公社是繼農業合作社之後，「在所有制方面進一步向『共有』發展。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逐步轉為公社所有，私人暫時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也將逐步轉為公有。」⁵⁰ 甚至為了辦食堂，個人家庭用的桌椅板凳、刀鍋碗筷也被「共」了產。在「共產」的同時，農村經濟組織成了工、農、商、學、兵，多位一體；農、林、牧、副、漁，全面經營的莊園式自給經濟。農民的生活也在「政社合一」的體制中實行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真的是「貧富不甚懸絕，地方政治容易施行」。這時，農業社會主義者最津津樂道的「一件震撼世界的奇蹟」、「一件震天動地的大事」⁵¹——「吃大鍋飯」誕生了。人民公社普遍實行了以平均主義為原則的糧食供給制、伙食供給制和生活基本需要供給制。有些地方還弄了「七包」或「十包」，即：包吃、穿、住、教育、看戲、治病、死葬、理髮、烤火和結婚等等。其實這些東西根本不是什麼值得大

驚小怪的新鮮事情。這種貧困基礎上平均配給的「共產主義」，早在一百年前，太平天國就計劃並且實踐過了。

農業社會主義的泛濫，給我們理論上帶來了極大的混亂。一些同志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一種基於高度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形態，他們從小農的平等觀出發，以為社會主義科學概念的全部含義，就祇是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按勞取酬「這種制度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⁵² 解放後，我們把戰爭時期的「供給制改工資制是一種倒退」；⁵³ 吃大鍋飯的配給制度，則在「『吃飯不要錢』這一點，已經衝破了『按勞分配』的範圍，具有共產主義『按需分配』的因素」。⁵⁴ 總之，他們不願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搞「開倉賑糧」式的吃大鍋飯、「割富濟貧」式的「一平二調」，以為祇要是「有吃有穿有錢花，公社真正成了我的家」，⁵⁵ 就是社會主義；他們把實現共產主義的希望，不是寄託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生活資料極大豐富的基礎上，而是依靠行政權力，不斷「共產」，不斷改變分配形式。對社會主義的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不過是套用了現代的革命辭彙，表達了舊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可在當時，我們得到的卻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說史上嶄新的概念：——「敢於與資產階級法權觀念決裂的農民。」⁵⁶

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幫」封建復辟的核心人物張春橋，早在1958年就利用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向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進攻。他在臭名昭著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中，^③ 攻擊物質利益原則是「錢能通神」、「鈔票掛帥」，把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與剝削階級的等級制度混為一談，把堅持按勞分配的觀點，說成是「資產階級為了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為了打擊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而對正確處理勞動人民內部相互關係的共產主義原則的攻擊。「煽動人們「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進行鬥爭。」⁵⁷

在一派震耳欲聾的大話、空話、假話聲中，毛澤東同志很快看

③ 1975年張春橋重新發表此文，可以看出其前後思想的一致性。

出了問題。他在1959年3月指出：「我們在生產關係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這就使得一些幹部「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⁵⁸毛澤東同志在建議中央採取措施剎住這股歪風的同時，明確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⁵⁹的命題，為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提供了科學依據。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黨中央頒佈了一系列農村整風整社的重要文件和緊急指示，剎住了浮誇風和共產風，把國民經濟從崩潰的邊緣挽救過來。但是，這場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的大發作，已經給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嚴重的惡果。大量財力、物力白白浪費，無數勞動人民的血汗付諸東流。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廣大農村更是深受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之害。大煉鋼鐵，使許多成熟的莊稼糟踏在地裡；一平二調，幾乎將農業社的積蓄和社員收入損失殆盡。本來挺興盛的農業經濟，被弄得凋零破敗，一片蕭條，人民生活水平也急遽降低，一些地區的農民甚至喪失起碼的生活資料。作者曾經在過的河南省遂平縣（原屬信陽專區），1958年放「衛星」，風頭出盡。1959年下半年，農民卻過著飯糗茹草、菜色縷衣的困苦生活，有些不得不流離失所、逃荒要飯，甚至因飢餓而倒斃於路旁！

人民血淚凝成的教訓，真值得我們共產黨人認真思索。

四

列寧說：「一個國家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鬥爭愈弱，群眾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通常也愈容易產生，而且保持的時間也愈久。」⁶⁰在我們有兩千多年專制歷史的國家裡，廣大農民以及幹部隊伍中，缺乏文化教育和馬列主義理論修養的現狀，就是產生

和發展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肥沃土壤。我們黨內外一個時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家長制作風盛行，很大程度上妨礙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和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儘管在1958年的實踐中遭到失敗，卻依然廣泛存在，一遇適當氣候，就會重新活躍起來。

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決不祇是簡單地表達了小生產者在貧窮中對財富的嚮往，它主要是表現了農民力圖恢復小生產的本能。很簡單，如果僅是出自對於財富的佔有欲，那末祇要打家劫舍就能滿足；農民起義之所以提出平均主義，實踐農業社會主義，正顯示了處於自然經濟生產方式中的小生產者的必有的世界觀。

在自然經濟狀態中，小生產者使用簡單的手工工具和畜力經營農業，一般祇能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從事自產自消的簡單再生產；與這種生產性質和生產規模相適應的理想的所有制關係，應該是小塊土地私有制。然而，這種分散、細碎的小塊土地所有制，卻不能長久。先不要說地主階級的巧取豪奪，就是這種經濟本身的發展，也必然不斷產生貧富的差別，使土地日益集中起來。當很多農民喪失了封建生產方式中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失去了生存的條件時，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希望有一種超經濟的強制力量，能夠用「平均」、甚至「公有」的辦法，制止兩極分化的趨勢，保障小農經濟正常運行。小生產者的這種願望，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倒不完全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專制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就曾經採取過諸如「均田」、「限田」、「輕徭薄賦」以及「官商」、「官工」、「重本抑末」一類措施，保護小農經濟不致受到土地兼併、高利貸盤剝和商品經濟的過份侵害。可是當土地集中和兩極分化成了不可逆轉的潮流時，農民就祇好發動起義，並在起義中提出用行政權力平均分配土地和平均分配其他財產的要求。這種要求邏輯發展的頂峰，就是農業社會主義，即：希圖用取消私有制、

實行平均供給和文化專制等一系列極端措施，一勞永逸地在生產、分配、消費和意識形態領域，根除兩極分化和土地兼併的可能，好讓小生產萬古長青。在現代社會中，大機器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農業與手工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陷入絕境。資本主義造成前所未有的兩極分化，理所當然地激起農業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同時也更加堅定了它使歷史車輪倒轉的決心。總之，農民的平均主義決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而是植根於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規模狹小、接近於平均劃一的自給經濟。基於這種經濟的世界觀，決不祇是要平分一些財產，其本質，是要排除一切干擾，恢復小生產，把整個社會改造成無數同名數相加而成的集合體，「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

農業社會主義表面上看來，確是反對剝削、崇尚平等的美妙理想。它那些激烈的極左政策，似乎表達了消滅人間不平的迫切心情。農業社會主義者憧憬著恬靜安謐的田園風光，渴望著互不相擾、安居樂業的家庭生活，可恰恰是這種個體家庭的小生產，「按其本性說來是全能的和無數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國範圍內一切關係和個人的齊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從一個最高的中心對這個劃一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發生同等的作用。」⁶¹ 因此，「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⁶² 農業社會主義幻想著用取消私有制和平均配給的辦法，來消滅人間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甚至不惜使社會倒退到小農經濟成熟之前的農村公社時代，不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⁶³

一種思想，一方面頑固地要求恢復和鞏固專制統治的自然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又反對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必然高高聳立的專制統治。這在邏輯上是一個「二律背反」式的矛盾。這種思想的矛盾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得最為典型。農業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往往就是專制統治的重建者；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同時就是封建專制統治

死而復甦的過程。那種高喊平等，對貧富不均疾惡如仇，迫令老百姓「窮過渡」，自己卻對封建特權甘之若飴，甚至擴大特權享受之人，在舊農民起義中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在我們的革命隊伍中，也不乏其人。可見，取消不平等，是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成份；維護小生產，才是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質內容。平均主義的理想是基於平均劃一的小生產，而維護小生產所必需的專制統治和等級特權，又是對平均主義理想的否定。農業社會主義不同於18世紀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它在實質上不是對未來的幻想，而是對過去的回憶。它的反動性，倒不在於它的空想成份不能實現，而在於它的實質內容本身就是對自己空想成份的否定。所有舊農民起義必然的蛻變過程、所有堅持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最終走向反面的事實告訴我們：當農業社會主義消滅不平等的幻想破滅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加強與小生產相適應的專制統治，靠超經濟的行政權力來恢復和鞏固自然經濟的道路。

當然，在現代社會中，絕對地回復到自然經濟狀態，是根本不可能了。但是，對農業社會主義者來說，人類所創造的文明，並不妨礙他們吃大鍋飯的欲望，並不能改變他們對科學進步的反感，也不能遏止他們用家長制、行會制的方式管理現代生產的企圖。農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大炸藥包能炸毀現存的一切，但它卻企圖把現存的一切納入小農經濟的規範。

在現代社會中，封建社會主義從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為了恢復建立在小生產基礎上的專制統治，而反對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文明；農業社會主義從小生產者的利益出發，為了恢復專制統治的基礎——小生產，而反對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文明。地主階級的封建社會主義與小生產者的農業社會主義，分別代表了兩個對立的階級的願望和利益。但是在恢復自然經濟、破壞現代文明這一點上，這統一於封建社會形態內部的不同階級的理想，卻又反映了同一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換言之，這兩種同屬過去時代

的思想，在反對剝削的問題上，它們是對立的；但是在倒退到自然經濟的傾向上，二者並無原則分歧。實踐表明，農業社會主義空想在實踐中的失敗，也就是封建社會主義「全面專政」學說的勝利。這個實踐過程，也就是農業社會主義維護封建統治的自然經濟基礎的實質，否定了自己消滅剝削的空想，而與封建社會主義恢復專制統治的實質，最後統一起來的过程。

林彪、「四人幫」的世界觀，就是這兩種世界觀的辯證統一。

林彪、「四人幫」反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因為這種生產將擴大人們的視野、豐富人們的社會聯繫，而自給自足、與世隔絕的自然經濟，才是封建統治的物質基礎；他們反對科學文化事業、殘害知識分子，是因為人類的精神文明意味著人民的思想解放，而人們普遍愚昧無知的狀況，卻是推行專制和皇權主義的必要條件；他們反對政治制度民主化，是因為民主才能使勞動人民真正解放，而權力高度集中則有助於他們篡黨奪權，實行家長制統治。這一切在今天看來已經是洞若觀火、一目了然了。可是，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林彪、「四人幫」為什麼能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幌子下對一切現代文明施以徹底地破壞，卻又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裡，不被人們識破其封建復辟的實質呢？——是由於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我們黨內和革命隊伍內部長期形成的巨大影響，才使他們明目張膽的封建復辟活動具有這樣大的欺騙性。林彪、「四人幫」幾個跳樑小丑之所以能猖行於世，有那麼大的政治能量，掀起反對社會主義的狂濤惡浪，也正在於他們的一些口號和奮鬥目標，反映和適應了小生產者恢復、鞏固自然經濟的天然要求。

馬克思指出：自然經濟「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⁶⁴ 在這種經濟形態中，農業小生產者「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

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係。」「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⁶⁵ 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牢固結合的自然經濟，造成了行政權力支配社會，也造就了小生產者崇拜不受限制的行政權力的世界觀。正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提高，對小生產來說不僅多餘，而且有害，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踐才必然帶來許多違背歷史、違反科學、甚至違反一般生活常識的極端措施。也正是因為恢復自然經濟無需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提高，小生產者按照農業社會主義模式變革社會的全部活動，才都是以「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的世界觀為指導進行的。

「四人幫」曾經一度代表了這種權力，賜予農業社會主義者大量的「雨水和陽光」。「四人幫」對發展商品生產的仇恨，符合於小生產者恢復和鞏固自然經濟的夙願；「四人幫」對文化界的壓制，滿足了小生產者對知識分子天然不信任的心理；「四人幫」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抨擊，照顧了小生產者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空想；「四人幫」對「自力更生」作「大而全」、「小而全」的解釋，迎合了小生產者閉關保守、自給自足的傳統；「四人幫」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厭棄，有利於小生產者對家長權威及皇權主義的崇拜……。在「四人幫」指天畫地、叱吒風雲的時候，我們清晰地看到農業社會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亦步亦趨的倩影，清晰地看到農業社會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地膨脹。正是在「四人幫」拼命吹捧法家、把封建統治的暴君酷吏打扮成農民利益的代表之際，在同一面反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旗幟下，他們把1958年對「右傾保守勢力」的衝擊，發展成對「黨內資產階級」的征討；把1958年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發展成對「反動學術權威」和「臭老九」的斃伐；把1958年對「條

件論」的批判，發展成對「唯生產力論」的圍剿；把1958年的「現場教學」、「農村辦大學」，發展成張鐵生式的「白卷英雄」和朝陽農學院的「社來社去」；把1958年消滅三大差別的幻想，發展成城裡人、腦力勞動者被驅趕到農村去從事體力勞動；把1958年否定按勞分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所有制關係上的「窮過渡」禁止集市貿易和家庭副業等一系列蠻幹的政策和作法都變本加厲地發展起來。太平天國走向反面的歷史和「四人幫」利用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踐，使我們清楚地看出農業社會主義與封建社會主義之間的必然聯繫，清楚地認識到農業社會主義在現代社會中的虛偽性和反動性。

「四人幫」的封建復辟，以及許多農業社會主義性質的實踐，都是穿著極左外衣、打著革命旗號進行的。他們的一些蠱惑人心的口號，表面上似乎迎合了小生產者的習慣心理，實際上卻是與勞動人民、包括廣大小生產者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現實利益相抵牾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社會基礎是廣大的小生產者，它消滅不平等的空想吸引著群眾，但它那些與生俱來的倒行逆施的極端措施，直接傷害了小生產者的切身利益，也必然引起小生產者群眾的不滿。這個發展過程，意味著農業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最終要走向人民的對立面。小生產者像它自己的理想一樣，處於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狀況。小生產者從切身利益出發，既要維護小生產，又想消滅剝削。其結果是消滅剝削的空想被維護小生產必需皇權保護的現實所否定，而皇權的存在需要強制小生產者納貢的現實和皇權擁有者的無窮欲壑，則又是對小生產者切身利益的否定。這個同一平面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已被中國封建社會循環往復的停滯和無數次農民起義帶來的改朝換代所證明，今天，再次成為我們革命史中的教訓。實踐證明，農民小生產者不是新生產力的產物，屬於將被現代文明最終消亡的階級。在他們經濟地位沒有根本改變之前，他們不可能自己求得解放。他們革命的努力，往往就是對自己革命的否定。農民反對剝削，這是革命的。但他們「幻想把小農生產普遍化，使它萬

古長存，這是反動的」。農民的要求「混雜著革命的成分和反動的成分。」「我們支持農民進步的利益和要求，而堅決反對他們反動的要求。」⁶⁶——這就是共產黨人的任務。可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幾乎是靠農民的努力才取得了勝利，我們黨的最大組成部分是由農民成分所構成。這就使得我們一方面很容易祇看農民的優點，而不看他們的缺點；另一方面，又不大注意從理論上，對農民階級的兩重性，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估計。由於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造成我們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長期缺乏科學社會主義的教育，缺乏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致使相當數量的黨員和幹部，分不清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的界限，習慣用小生產者的平等觀理解社會主義革命，習慣用表面前進而實質倒退的辦法來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極端革命」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才一次又一次地迷惑了我們的一些幹部和群眾，甚至被「四人幫」一類以極左面目出現的封建復辟狂所利用。

今天，「四人幫」被粉碎了，農業社會主義的實踐，也開始受到了批判。然而，這並不是簡單的宿命地實現的，它是通過無數革命者奮不顧身、屢踏屢起的英勇鬥爭，通過千百萬人家的悲歡離合實現的。回顧我們黨30年來的戰鬥歷程，我們不僅和封建主義的復辟戰鬥過，而且我們的許多重大的政治鬥爭和政治事件，也是圍繞著按無產階級世界觀、還是按小農世界觀改造世界這一線索進行的。在鬥爭中，我們不僅為封建主義的復辟活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也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泛濫付出了極大的犧牲。

多難興邦。經過30年曲折反復之後，當我們重新開始在實踐和理論上研究解決一系列過去所沒能解決的問題時，徹底清算農業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也重新擺在我們面前。這個任務對於處在小生產者汪洋大海之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異常艱巨的。但是，我們相信，人類文明的歷史步伐是永遠向前的。隨著大機器工業的發展，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早晚有一天，中國無產者也能驕傲地為農

業社會主義鐫刻這樣一篇墓誌銘：

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這樣就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這種社會主義按其積極的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工業中的行會制度，農業中的宗法經濟，——這就是它的最後結論。

這一思潮在它以後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歎。⁶⁷

註釋：

- 1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解放社1948年，第138頁。
- 2 分別見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全集》第一卷，第212頁；〈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鬥爭〉，《列寧全集》第十卷，第407頁；〈報紙上的一篇短文〉，《列寧全集》第二卷，第277頁；〈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九卷，第434頁。
- 3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全集》第一卷，第221頁。
- 4 列寧：〈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列寧全集》第二卷，第458頁。
- 5 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卷，第215頁。
- 6 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

者？〉，《列寧全集》第一卷，第265頁。

- 7 引文均見〈天朝田畝制度〉，《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321~322頁。
- 8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II，第204頁。
- 9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II，第231頁。一說五兩以下准許個人所有。
- 10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II，第275頁。
- 11 〈金陵被難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VI，第750頁。「天王」疑為「天父」之誤。
- 12 胡恩燮：〈患難一家言〉，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二冊，第338頁。
- 13 羅爾剛：《太平天國史事考》，第331頁。
- 14 〈詔書蓋璽頒行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313頁。
- 15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II，第232頁。
- 16 〈詔書蓋璽頒行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313頁。
- 17 洪仁玕：〈資政新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I，第525頁。
- 18 張德堅：〈賊情彙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II，第232頁。
- 19 以上引文均見〈天朝田畝制度〉，《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I，第322頁。
- 20 金毓黻、田餘慶等編：《太平天國史料》，第138頁。
- 21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 405頁。
- 22 詳見拙作〈農民與反封建〉，《歷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 23 〈論語〉，《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先秦部分·上·第270頁。
- 24 引文見康有為：《大同書》，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35、240、191、235頁。
- 25 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見陶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8頁。
- 26 孫中山：〈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孫中山選集》三卷，第439頁。
- 27 孫中山：〈三民主義〉，《孫中山選集》下卷，第798、805頁。
- 28 列寧：〈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九卷，第426頁。
- 29 《毛澤東同志在晉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第10~11頁。
- 30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65頁。
- 31 見寧可：〈漢代農業生產漫談〉，《光明日報》1979年4月10日。
- 32 列寧：〈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32卷，第446~447頁。
- 33 見國家統計局編：《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統計出版社1958年，第26、16頁。
- 34 見薛暮橋、蘇星、林子力等著：《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第61頁。
- 35 見《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頁。
- 36 見薛暮橋、蘇星、林子力等著：《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第62、60頁。
- 37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列寧選集》第四卷，第92~93頁。
- 38 毛澤東：〈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1頁。
- 39 以上百分比均見《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第181~184頁。
- 40 列寧：〈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列寧全集》第18卷，第582頁。
- 41 列寧：〈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31卷，第457頁。
- 42 列寧：〈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列寧全集》第九卷，第428頁。
- 43 列寧：〈我們黨的綱領草案〉，《列寧全集》第四卷，第213頁。
- 44 見《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47頁。
- 45 《孫中山社會主義談》，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第3頁。
- 46 新華社訊，《人民日報》頭版，1958年10月6日。
- 47 葛德：〈人民公社頌〉，《人民日報》第八版，1958年9月1日。
- 48 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人民日報》第三版，1958年9月1日。
- 49 《人民日報》編者：〈神話似的現實〉，《人民日報》第十版，1958年10月1日。
- 50 河南，遂平，〈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人民日報》第三版，1958年9月4日。
- 51 廖士祥：〈談「吃飯不要錢」〉，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10頁。
- 52 楊永慶：〈怎樣搞好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江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頁。
- 53 王茂湘、張芳源、陳方、阮仁慧、侯學林、黎康時、楊綱、蕭灼基：〈供給制改工資制是一種倒退〉，《人民日報》第七版，1958年10月18日。
- 54 廖士祥：〈談「吃飯不要錢」〉第10~11頁。

